

上外高翻短期參訪有感

杜欣欣

2009年夏，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以下簡稱臺師大翻譯所）十餘位碩博士生共赴上海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以下簡稱上外高翻）參加短期進修，課程為期二週，醞釀已久的交流計畫終於成行。中國的高翻學院相當於臺灣的翻譯研究所，在國際交流頻繁，專業人才匱乏的情況下，翻譯專業教學遂成為時勢所趨，而上海外國語大學高翻學院自2003年成立以來，迅速在翻譯專業人才培訓方面竄起，與北京高翻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其實，臺灣翻譯研究與專業人才培訓發展腳步要比中國來的早，面對這股後起之勢，我們能有什麼樣的啟示？上外高翻院長謝天振教授幾次到訪臺師大，演講譯介學之餘不遺餘力推動各項交流活動，歡迎臺灣學生赴上外短期交流，而臺師大翻譯所所長李根芳教授同樣鼓勵同學實地參訪，瞭解各地高翻學院的發展，這次的學生交流活動即是在雙方努力下促成的。此前，兩方學術單位已有許多交流經驗，透過研討會以及上外高翻學院教授訪問行程，分享彼此教學和研究動態，但實際學生交流還是初次。

這次短期進修參加同學以筆譯組為主，包括兩位博士生還有兩位外籍生同行，大家多半已完成碩士或博士班訓練課程，準備進入論文寫作階段，對於上外高翻的種種，一行人都感到相當好奇。除了希望瞭解上外高翻的專業訓練與臺師大是否有所不同，

也希望瞭解上海的特殊位置如何影響當地翻譯研究趨勢與專業訓練。昔日，上海乃十里洋場，各國競逐之地，多語和多文化交會的所在，而今日的上海更積極與世界接軌，對於翻譯的專業分工與要求也變得更為細緻。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難免產生一股隱憂，臺灣的翻譯研究是否無力迎頭趕上趨勢，甚至落於人後？尤其上外高翻於 2008 年第一批博士生，計六人順利取得學位，反觀臺師大同學尚在努力中，上外高翻學術研究工作方面是否有什麼值得借鏡的地方？唯有實地走訪，親身參與課程，也才能有更深一層的體會，解除疑慮。

這趟短期進修的課程設計與內容安排相當彈性，事前經由臺師大同學提出的學習需求，彙整後寄交謝天振教授擬定完成。最終敲定的課程內容包括口筆譯理論與實務、電腦輔助翻譯軟體應用、文學翻譯等，其中電腦輔助翻譯在臺師大尚未開過。兩週的課程非常密集，每日安排全天課程，上午由高翻學院幾位老師授課，下午則為討論時間，延續先前授課內容展開討論與對話。而兩週課程分為兩個模組 (model)，第一週的課程對象主要以臺師大同學為主，同時也有高翻學院同學參與，增加兩校同學交流機會。第二週加入其他大學英語文相關學系的老師，他們是由各校薦派，希望瞭解上外高翻課程設置與翻譯研究發展，作為各大學翻譯課程或設置翻譯系的準備。第一週課程對象同質性高，對於翻譯研究相關論述與訓練課程已經有了先備知識，大家在同一對話平臺上，討論自然較為深入。反觀第二週課程討論的水平較為參差不齊，這是由於新加入的各地教師對於翻譯研究範疇尚在摸索階段，多半為了因應各大學開設翻譯系的需求到上外高翻取經，因此就翻譯研究領域所提問或發言的層次也有些隔膜，討論中不易產生共識。但在另一個議題上卻能夠有一致意見：中國掀起一股翻譯學系設置風潮，卻忽略專業翻譯人才培訓門檻高，精緻化，尤其在當前師資明顯不足，大學部學生外語能力有限的條件下，新學系未來的發展恐怕難有顯著成果。

整體而言，上外高翻的修業條件與課程安排大致與臺師大相同，但

在專業人才培訓方面，目標要來的更加明確。上外高翻碩士課程分為會議口譯系、專業碩士系（MTI）與譯學理論系，理論與實務在入學前便已分軌。相較下，臺師大翻譯所學生入學考試分為筆譯與口譯兩組，修畢第一年後開始選擇實務、理論、產業三個方向。就實務訓練內容來看，上外高翻明顯以培養聯合國以及其他國際會議譯員為主，工作內容緊鎖定財、政、法三個方向，可謂與中國國家對外發展情勢相結合。不僅如此，上外高翻訓練的相關配套非常完善，學生有機會赴日內瓦、肯亞、美國各地實習，能將在學期間所受的訓練運用在實際場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筆譯培訓側重現代工具的掌握，以及團隊合作承接大型案件的能力，而院內成立的聯合國文件翻譯小組正是團隊翻譯效能的最佳體現。據瞭解，目前聯合國糧食計畫署組織文件的中譯工作多由該翻譯小組負責，在聯合國會議進行的同時，翻譯小組隨時在工作室待命，稿件一到，譯者群立刻發配工作，分頭進行，最後進行整合定稿。翻譯小組負責人姚錦清老師表示，透過專業譯員組織分工，逾十萬字的英文稿件可在短短幾小時內完成，效率實在令人嘆為觀止，從而也顛覆以往對翻譯工作形影孤單，一人挑燈夜戰的形象。

上外高翻的進展是無庸置疑的，透過上海的政經優勢，得以網羅全球口筆譯專業人員培訓新手，甚至突破大學教師任聘條件，破格延攬實務專長者，加之與國際組織合作良好，這些都是上外高翻短短數年時間就能晉身全球一流口筆譯研究培訓機構的物質條件。目睹此番光景雖不至於教人自慚形穢，卻難免有自嘆弗如之感。臺灣雖有高素質的口筆譯專業人員，但整體發展環境與案件規模是難以望其項背的。上外高翻師資多具有國際口譯協會會員（AIIC）資格，撇開強大陣容以及國際合作關係不談，臺灣長期處於國際政治外交的邊緣上，地位窘迫，無緣接觸聯合國會議文件這一塊，每年參與的大型國際會議也相對有限，市場需求遠遠不及中國。猶有甚者，上外翻譯小組的分工效率驚人，他們大量藉助電腦輔助軟體，在此過程中又大量餵養翻譯語料，就某些聯合國文件

翻譯案來說，這支翻譯小組穩穩壟佔市場，最終可能成爲寡頭，只要翻譯品質能維持一定的水準，便可能不受優勝劣敗或比價等市場機制所左右。曾幾何時臺師大翻譯所也有翻譯工作小組，但小組成員爲自由譯者，喊價並不低於市場價格，在臺灣這樣多頭競爭的環境很難支撐下去，遇到大型翻譯案也不容易吃得下來，最後無疾而終，雙方處境是何等不同。這裡頭的差別可能有環境因素也有風土人情的不同：是不是習慣服膺集體意識，中央領導的社會條件較容易集結群策群力的工作小組？而習慣依個人行事，愛好 SOHO 型態的社會條件則不容易要求一組人馬隨時待命，產生使命必達的精神？

在翻譯理論課程部分，爲因應臺師大同學學位論文寫作需求，謝教授特別提到學位論文寫作三意識，他所務繁忙，依然撥冗會面，針對同學論文提綱逐一給予意見。在一下午面對面討論過程中，他不僅提出具體的批評，更重要的是爲同學的論文寫作方向提供一條出路。當日下午，同學們無不把握這難得機會求教於謝教授，輪番提問，直至幾個鐘頭過去，眾人經歷熱烈討論與腦力激盪，謝教授才得以喘口氣休息。如此精采的討論辯答過程讓人獲益良多，對於謝教授傾囊相授，十分感激，謹代表同學們在此一併致謝。除了導師個別指導，謝教授相當重視學生討論會，在其主持下，不同年級的碩博士生或教師齊聚一室，針對個人近期研究與閱讀交換彼此看法。謝教授談到，意見交換與辯論的過程是推進學生思考的絕佳平臺，除此之外，學生埋首於自己的研究課題之餘，也能在最短時間瞭解他人研究動態；交換訊息，這點確實是提升學院整體學生研究素質的不二法門。在臺師大，類似的學生交流活動多學生自動發起，以讀書會方式進行，可惜由於自我約束力不高，還有學業工作生活繁忙，最後往往無疾而終。看過了上外高翻的討論課，難免有感於臺師大碩博士生之間交流不足，缺乏相互討論的渠道，所幸這兩年在李所長推動下，催生了第一屆碩博日與第二屆跨學院碩博日，稱得上是學生學術交流的一大進展，但較之每週定期討論尚有不足。這個問題又回歸到碩士課程分流

上頭，按照目前課程設計方向，臺師大碩一實務理論並進，同學目標還不明確，也就沒有參加討論會的動機。加上本地博士課程修業年限長，不像中國，三年下來即可拿到學位；沒有急迫性，也就不以為有每週討論的必要，碩博交流機會自然也就更少。識者或許認為，臺師大翻譯所碩博合開的課程也是一個大弟子與入門弟子交流的空間，確實如此，但若要談規模，其實也僅限於修課與旁聽學生而已。如果我們認為碩博生每週定期交流有助提升整體學術水準，那麼要在既有課程架構下改善現況或許不難。比方說，以必修課的形式開一堂碩博討論課，為期至少一年，此舉直接效益是碩士生可從中吸取經驗談，避免多走冤枉路，而博士生透過分享更能釐清抽象概念，在研究的路上不再踽踽獨行，孤軍奮鬥。

介紹完整個活動大致內容後，接下來想就這次短期交流談談一些感想與淺見。實地走訪一趟上外高翻，最大的收穫是心裡原有的一股焦慮感不再，認識上外高翻的發展，更覺得我們應該走出一條自己的路，更何況我們有自己獨特的環境，而且多年在此領域也奠定良好基礎。首先，就雙方發展來看，由於政治現實不同，我們自然無法培養直接與聯合國口筆譯合作的專業人才，但這不意味我們培養出來的人才無法勝任會議口筆譯與文件筆譯等專業任務。欣羨上外高翻同學的實戰經驗時，也別忘了臺師大出來的口筆譯人員儘管沒有同樣的舞臺，卻也能有不錯的成就與表現，最要緊的是找出最適合我們發展的專業方向，才能從培養「翻譯人才」的搖籃落實為培養「專業翻譯人才」的搖籃。

要增加同學翻譯能力，提升專業形象，重新設立翻譯小組是一個很好的方法，由實務組同學推動運作豈非是最好的專業訓練？而在產業訓練中或許也應加入開拓市場、譯案整合、品質掌控這幾項。翻譯小組的存在既要能符合專業訓練目的，也同時肩負起一部分打造臺師大翻譯專業品牌的工作，兩者可收相輔相成之效。上外高翻並不鼓勵同學在學期間自接譯案，而是希望同學專注於院內專業訓練，這是非常值得借鏡的作法。在學期間，實作經驗雖然重要，自行承攬譯案與專業訓練畢竟不可同

日而語；缺少檢討與反饋，縱然練習量增加，但卻未必有顯著質性提升。要知道，上外高翻擅打專業口碑與建立自家品牌，這是市場機制裡生存的不二法則，其翻譯小組在這裡頭就扮演舉足輕重的腳色，稱得上是一張好牌。放眼臺灣各翻譯系所或文學院，設立翻譯中心者所在多有，而臺師大翻譯所竟然沒有翻譯小組，少了一個推動自家專業形象與口碑的利器，怎不可惜？就臺灣市場而言，長期大型譯案數遠不如中國，因此單就經濟考量可能無法養活一個所裡的翻譯小組，但專業訓練亦不宜僅以工作收入為考量，反應將整體經營與參與視為課程要求的一部分。話說回來，好的口碑都是所內學生未來踏入社會的無形資產，也是提升翻研所競爭力的一項指標，大家應該樂見其成，共襄盛舉。

總之，上外高翻的發展與上海大城國際金融地位的崛起不無關係。地緣因素使得其更容易接觸外國，對於發展契機也更為敏銳，從而使人見識更為廣闊，這或許是上海翻譯發展環境不同於臺北的主因。上外高翻從一開始便將目標設定在培訓高級專業口筆譯人才，就連學院整體翻譯類型方向也很明確，走的是財、政、法三線，而這也就是為什麼能集中火力，在短時間內攻下山頭，成為一流培訓中心。此外，與業界同步也是上外高翻的競爭力之一，電腦輔助翻譯軟體課程有助於熟悉常用軟體，受過相關訓練的學生進入市場也容易立即上手，不須等到實習階段才有機會接觸 CAT 軟體。專業分工、方向明確、務實求新、加上留心國際動態，這些說不定正是上海特有環境觸發的敏銳性，若非如此，恐怕難以在競爭激烈的市場占有一席之地。

上外歸來，瞭解一事，環境不同所需要的專業也不同，那麼，臺灣要培育的高級專業口筆譯員方向在為何？科技、法政、金融、文學領域殊異，若要包山包海，不做領域區隔，可能的結果將恐怕是單具翻譯能力，但缺乏專精，最後造成同學畢了業卻不見得符合市場需求。出身外文系的同學情志多半偏向文學類，然文學類在整體翻譯產量裡充其量只是小宗，加上出版品整套行銷機制，換言之，此間翻譯機制不同於其他以溝

通信息為旨的文類，難以冠上「專業」二字。然而，恰巧文史哲處理層面較為複雜，因此適於作為練習材料，從中討論各種翻譯可能遭遇的問題，與譯論課程結合或許更為適合。就此看來，分流訓練或可採「譯論」、「專業」二途，如此一來，兩者能夠兼具理論實務，而且各有所精。舉例而言，文學翻譯練習與西方各派文化思潮較適合放在譯論組，而專業練習與語料庫對比分析等語言學相關理論範疇自然適合專業組。此處提出的分流建議自有其限制，兩者間的理論範疇並不是可以完全切割的，而是希望讓碩士生進入翻譯研究這個領域時有初步方向，專業以市場為導向，譯論以研究為進途，使訓練階段的目標更明確些。臺師大翻譯所成立以來在文史哲領域有著良好基礎，中外譯論兼備，發展至今，或許應該轉向臺灣翻譯史研究，並從在地出產的翻譯作品中探索其中反映的社會文化面。第十四屆口筆譯教學研討會上，王宏志教授以清末中國通事為主軸，側寫中外交流另一風貌；無獨有偶，臺師大賴慈芸老師多年前也有研究臺灣通事的念頭，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研究題材。換言之，臺灣翻譯史相關課題尚是一片未開墾之地，可做、應做的研究相當之多，欠缺臺灣這塊圖譜勢必無法補全華語圈的整體翻譯史，而就現階段而言，這正是我們絕佳的著力點。

最後還是得談談博士課程方面。臺師大翻譯所 2003 年招收第一批博士生，比上外高翻早了兩年，但 2008 年第一批中國翻譯博士拔得頭香，搶先出爐，而臺灣的第一個翻譯博士最快也要 2010 年才能取得學位。想必大家都很疑惑，為什麼臺灣翻譯博士如此難產？上外高翻柴明穎教授在中國第一批翻譯博士出爐時致詞表示，醜媳婦也該見公婆，口氣幽默風趣，想是為當天在座幾位準博士打氣。而此處的情況是，博士生早已修畢所有課程，但許多人兼顧工作與研究，恐怕自己幾年下來讀書不敢算透徹，立論不敢說扎實，真是醜媳婦情結深了，難免扭捏，臺灣翻譯博士第一人，將成為所有後繼博士生的指標，如此的壓力不可謂不大。又書唸久了，知道有更多沒讀的，未逮之處甚多，下筆寫文章，少了一點理

直氣壯。走看國內外翻譯研討會，明知在這領域大抵熟門熟路，心裡還是戒慎恐懼。總而言之，學長姐早是一肚子翻譯經，卻自信不足，這樣看來我們確實比人家慫慢。再者，大多博士生走的是比較文學路線，邊讀邊品味，樂在其中，至於學位，似乎也沒必要刻意急在一時。如此的心態與中國博士生南轅北轍，據說在中國攻讀博士平均花三年，寒窗苦讀時日再久，恐怕要落人笑話。而且大環境競爭性強，完成學業的時間壓力顯然較大，對於他們的成就與抗壓性，由衷欽佩。但持平而論，學術養成不該與績效畫上等號，雖然最終的論文未必見得慢工出細活，但累積下來一段時日，應當會有一定的底蘊。

總而言之，雖然臺師大翻譯所表現沒有上外高翻來的亮眼，但我們真的不能、也沒有必要妄自菲薄。反當找到自己的路，堅定走下去，畢竟學術專業發展並非一蹴可及。有幸走訪上外高翻，蒙東道師生熱情款待，十分感激，而此行所見所聞牽扯出一番隨想，文中所述，為個人淺見，諸多不周之處，但請海涵。